

解读周作人

刘绪源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解读周作人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周作人 / 刘绪源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 - 7 - 305 - 17826 - 9

I. ①解… II. ①刘… III. ①周作人(1885 - 1967)
—散文—文学研究 IV. ①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233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名 解读周作人
著者 刘绪源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03 千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7826 - 9
定价 40.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njupress
销售咨询：(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它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

代序

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

舒 芜

近些年来小品散文读物的流行，大概是适应了“文革”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冲击之下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我能够理解，可是有时也觉得这种需要似乎日益走上轻软纤小之路，未必是文学发展的健康状况。常常看见书摊上，周作人散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并列，我总是若有所感。也常常看见报刊上有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的言论，还直接接触过这样的读者，他说是爱读周作人，细谈起来，他其实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的同样趣味来欣赏周作人。我从这些，深感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误事，周作人的真味并不在此。半年以前，我写过一篇《误读知堂》的小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18日），有云：“相当一些读者的心目中，周作人成了纯然闲适、轻松、飘逸、清雅的形象，以此而受到欢迎，这也许是适应了‘文革’以后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实在却是误读。”周作人的真味是什么呢？“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是着重拈出一个‘苦’字，是以苦味为自己的真味，他感谢能欣赏他的真味的人。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有‘闲适’的一面，但仅仅是‘貌似’，仅仅是‘近于’，他担心这一面‘误人’，怕读者一味跟着闲适下去。”这个意思，1986年我在《周作人概观》里就详论过，现在重申，是由于实际掌握了两个误读周作人的例子，虽然

误得很荒唐，但推其致误之由，却正是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故，应了一句老话，“雅的俗得紧”。那篇小文中并未提出梁实秋、林语堂来作比较，我心里是想到这个问题的。我并不是把梁实秋、林语堂等等都看作“雅的俗得紧”，我承认他们都是散文名家，但是不能与周作人等列齐观，因为他们都没有达到周作人的简素苦涩的境界。我大致有这样的想法，但并没有深入研究过，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来。

最近读了刘绪源先生的《解读周作人》(以下简称《解读》)一书，给我很大教益。我只看到有些读者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解读》则一上来就指出另外一种更其尖锐的情况，即许多读者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秾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解读》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后，就反复比较了梁、林、丰等人与周作人的同异，见出文艺研究的真功夫，使我这样一个略知其意而未尝下过功夫者佩服不已。

《解读》指出，林语堂散文纵横捭阖，任意而谈，亦庄亦谐，而又文采熠熠。他先前也写过“浮躁凌厉”的文章，后来一变而提倡幽默与闲适，从此对过去仿佛了无牵挂，不像鲁迅和周作人那样，在文章中永远看得出他们那沉重的过去。林语堂的闲适是真闲适，他的名文《言志篇》就是一个无牵无挂、很满意于自己境遇的绅士先生悠悠然的内心袒露，没有一丝对周遭人生的不满不平之气，没有一点苦涩的滋味。他的文章缺乏更深沉的情感和意识，所以不十分耐读，尤其经不住将他大量的文章放到一起来读。

《解读》指出，梁实秋散文艺术的成就，在林语堂之上，他下笔

雍容大度，颇有周作人式的“谈话风”。但是，看他的小品文集，相当规范齐整，给人以小心拘谨之感，不似周作人每一集的驳杂随意，潇洒大气。梁实秋的幽默太显眼，又用得如此普遍，读得多了，反倒显出了一种单一。他的幽默的最成功之处，是善于嘲弄（包括自嘲）人生的各种细小的窘相、穷酸相，但对总的社会人生却是比较满意的，没有周作人那样内在而广大的压抑与幽愤。梁实秋偏于巧，而没有周作人式的拙；其滋味是酸而略甜，可口宜人，不是周作人那样一味地苦涩。《解读》还指出，丰子恺散文的文雅淡泊，其实也与周作人不同。丰子恺的淡是真正的平淡，他对当时的人生现状也不满，他避居乡间，追求宁静，真正做到了视而不见。而周作人则永远不满，他的思想家型的深思苦虑使他将人间的黑暗看得很透，越是故意装作看不见，越显露出了他内心的苦涩。丰子恺的散文如一盘家常菜，如田头里巷的闲谈，有情有趣，不高深，但也没有太多的启悟与回味，不似周作人那样每在平淡朴拙之中包藏着惊人的渊博与启人的深邃。

《解读》中对诸家的比较分析，上面只是作了粗略的介绍，原文当然详尽展开得多。他的结论是：“总之，周作人的‘简单味’并不简单，在他的朴拙中总是包藏着丰腴，这是丰子恺所不具备的。他的‘涩味’更其复杂，不仅为丰子恺，也为林语堂、梁实秋及许许多多同时代散文家所不具备。”

还不止此。

在周作人研究中，一向有一个问题，即对于周作人晚年文章，尤其是那种往往通篇用大量引文连缀而成的文章，被人嘲为“文抄公”的文章，究竟如何评价。我曾在《周作人概观》中说过：“到了晚年，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又说：“不仅是内容上的‘六经注我’，连引用来的古人的文章也像是周作人的

文章。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句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周作人从自己的文章里善于吸收文言文的成分，到直接抄引古人的文言文纳入自己的文中成为有机的部分，斯艺可谓已臻绝顶，再想超过也是难了。”我说这些话，都是有所针对的。有些研究者贬薄周作人晚年文章，指为才尽，指为脱离现实，指为写不出文章只好大抄古书，我不同意，所以说了那些话。但是，我侧重在其所引的古文都像是周作人自己的文章这一层，尚非探本之论。对于所谓“文抄公”的文章，究竟在周作人的整个散文成就中居于什么地位，我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正面的评价。今读《解读》，分明地照出我的不足。

对于周作人的以大量抄书为特色的书话，《解读》从学术和艺术两方面，给以极高的评价。学术方面，《解读》认为，周作人是以零星随感、积少成多的方式，对中外典籍，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的笔记小品，做了一次系统而又极富个性的研读和整理。“周作人一生中，书话创作的数量最大，在这方面所花工夫最多，这些抄书之作，也许是他的最宝贵的遗产。”艺术方面，《解读》指出，周作人的抄书之作，同是通篇黑压压一片的引文，而其文章布局，曲尽变化之妙。有的是连类抄引，一环扣一环，峰回路转，变化多端，似乎有些东拉西扯，却令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读过之后，只感到扎实和丰满，丝毫不觉其贫薄松散。有的是横向并列的抄录，需要更完整的学问，但总保持着雅趣与可读性，异于一本正经的沉闷的学术论文，在夹叙夹议的行文之中，所抄之书有的成了“叙”的内容，有的代替了“议”的作用。此外还有种种抄法，每种抄法又可以有各不相同的运用。《解读》以极鲜明的态度肯定道：“他的不少抄书之

作，其审美价值，其给予人的充实感、丰富感与满足感，是超出他早期的小品之上的。”《解读》以极大的理论上的勇气，做出这样的论断：“《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这真是极大胆之论，似乎有些惊世骇俗，细想却是完全真实，十分平实的。

周作人晚年还有一种并不大量引古书，只是平平常常说话的文章，我所谓刊落浮华，枯淡瘦劲，文境更高者即指此。我虽然这样说了，却并没有充分思考这“更高”二字的蕴涵。《解读》则真正比较了周作人早年名作和晚年本色文章，指出：“当人们为知堂散文出选本时，或想挑选几篇做出评论，或向初读者推荐一些选目，为达到一定的效果，使其更引人注目起见，所选的往往是周作人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何以如此？只因为它们更好评，更好看，更能让人一下子读出好来。但事实上，知堂散文更精彩的部分，真正能够代表他的最高艺术追求的，恰恰不是这一部分，而是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一旦你改变了过去的看惯漂亮衣服的阅读目光，真正从这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了人的魅力，那么，你就将获得更为深邃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里，你也会有‘一览众山小’的真切体验。”这些话说得真好！我就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周作人的晚年本色文章，和他那些早年名作，在我心目中的真正地位还是二者大致相等，更严格地说，恐怕还是把他那些早年名作看得略重一些。让我来选，我也会以选录他早年那些名作为主；我会比别的选本更多地选录他那些“文抄公”之文；而对他晚年完全刊落浮华也不大量抄书的本色之作，我就不会选得太多，分量上比较起来就成了“聊备一格”的样子，尽管我的本意不完全如此，实际上的畸轻畸重还是

清楚了。

这样看来，可以说有五个层次：一是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者。较高一层是能欣赏周作人，而实际上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水平来欣赏周作人，将他们等列齐观者。再高一层是能知周作人高出于梁实秋、林语堂之上，但在周文中只欣赏其早年名作，不能欣赏其中年以后更成熟之作者。再高一层是能知周作人中年以后那些“文抄公”之文的价值，而对于那些不大抄书的完全本色文章的价值未能充分看重者。最高一层是能明确推重他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超越早年名作之上者。对照一下，我自己的位置，大概刚刚够得上第四个层次，这就知道了今后提高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读后也增加了迷惘。我本来是对近年读者对散文的爱好日趋于轻软纤小之途有所疑虑，希望周作人不要被误读以助成此种趋势，希望他的真成就真价值能为读者所领会，或者是提高审美追求、救治轻软纤小之病之一法。读了《解读》之后，这希望却渺茫起来了。《解读》一开始痛陈读者不能欣赏周作人的现象之后，立即一转而用乐观的口气说：“好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只要硬着头皮往下读，读它七八篇十来篇”，“还有一个消除隔膜的方法，那就是在自己与周作人之间找到一座桥，先读一些自己易于接受而又比较接近于周作人的作品”。他说得虽然乐观，我却不禁想：这是可能的么？有几个读者肯下这番功夫呢？他们要的是香甜适口的小零食，拿起周作人散文来一尝，完全不对口味，有几个不丢在一旁，还肯下那些苦功去硬啃，去适应，去找过渡桥梁呢？《解读》里面就说：“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过于苦涩耐读之作，读者面必然不广。但求仁得仁，知堂老人还是实现了他自己的艺术追求的。”求仁得仁，这说得就很悲观。为了艺术追求，就得付出被

冷落的代价。追求者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但从劝说读者如何如何下苦功去适应去领会的研究者来说,他的劝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滋味也很是苦涩的了。

但是,《解读》这本书,又是愉悦的产品。其后记有云:“这两年外面天翻地覆,有不少立志以笔耕为业的朋友,终于弃文从商,‘下海’去了。也有人见我还在埋头写作,惊讶不已,仿佛我已成了世间的怪物。然而,我确实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一种在艰难跋涉中时时都有新发现的快乐,令人备觉艰辛而又备感充实。我想,即使一夜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那快乐也难以与之替换吧。于是我继续写,并没有那种愤愤而为或自我献身似的悲壮感,只如鱼之在水,自然而又自然。”原来,不论市场经济的狂潮怎样冲击,而如鱼在水似地从事高品位的冷门的研究和写作者,仍然有刘绪源先生这样的人在。喜真赏之尚存,知斯文之未坠,让我们还是希望着吧。

1994年12月9日

目录

代 序 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 (舒芜)	I
第一章 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 ——兼说“涩味”与“简单味”	1
第二章 蓬头垢面的“过客”与心绪郁结的“绅士” ——关于人生与艺术的选择	31
第三章 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上) ——“牛山体”诗与知堂杂著	64
第四章 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下) ——知堂小品与知堂书话	93
第五章 结构、技巧与人的魅力 ——对一个艺术难题的探讨	136
第六章 “言志派”的渊源与流向 ——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合论	163

附录

知堂的回忆文	198
梦一般的记忆	202
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	207
《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	218
周俞通信中的学术公案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	243
也说钱锺书与周作人散文	252
后记	259
再版后记	264
三版后记	266

第一章 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

——兼说“涩味”与“简单味”

今天的读者，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实在是隔膜得太多了。

时轮运转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不知是出版界唤醒了读者的兴趣，还是读者兴趣的转移提醒了面临窘境的出版业，总之是，“五四”以后的名家散文突然走红，各种版式的“旧书新刊”或“旧文新编”争相问世。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一时间成了书肆与读者口中出现得最多的名字。

周作人如果在世，尽管他仍会略垂双眼，紧闭双唇，保持他那一贯的淡然和矜持，内心却终将感到无比欣慰的。因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为自己的名字不能上报，自己久久不再被人提起而愤愤不平。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称此为“默杀”。

然而，当读者将这些名家的旧作捧回家，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秾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

不止一次地听文化界的人说起，读周作人的作品感到吃力，提不起精神，感到他语言的平淡拖沓，有时还感到一种不慌不忙的啰唆，加之题材的驳杂，引文的古奥，常常翻不了多久就掩卷，搁置在一旁了。

这实在令人吃惊和遗憾。当年首创新文学“美文”的大师，因为文字的纯朴精美曾被许多评论者称为“炉火纯青”的周作人，今天竟得不到新一代读者的认同！——好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只要硬着头皮往下读，读它七八篇十来篇，开始为他那独到的见地或高雅的书卷气所吸引，渐渐地习惯了他那不温不火回旋往复的语言节奏，逐步体验到了知堂散文的独特的美，这时，隔膜就会消逝。你的眼光会被这些平淡的作品所吸引，你会从这些黑压压的字行里领略到一种在别处难以觅得的魅力，你甚至会成为周作人迷。

或者，还有一个消除隔膜的方法，那就是在自己与周作人之间找到一座桥：先读一些自己易于接受而又比较接近于周作人的作品，比如当初的梁遇春或钟敬文的小品，比如今人张中行的雅淡深邃的回忆文，或黄裳的书卷气十足的书话散文。在迷上了这些作品之后，再去读周作人，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更上一层楼”的喜悦，会发现你所喜爱的那些美文的渊源所自。你也许会就此以更大的热情迷上周作人。

为什么读周作人需要这样一个习惯的过程，而读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徐志摩……却不需要这样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深刻的艺术现象。

这使人想到了许多特殊的艺术家。

我首先想到的是福楼拜。当然，我是通过李健吾的翻译阅读福楼拜的，这其实已是两个艺术家的共同的创作。从来没有读过巴尔扎克或雨果的人，可以一下子接受巴尔扎克的滔滔不绝的精确剖析，也可以接受雨果的汪洋恣肆、激情澎湃和情节上的出其不意的圆满——即使一边读一边在心下抱怨它们太过庞大，却也会承认这庞大是一个小说大师应有的权利。可是初读李译的福楼拜，却有可能马上产生一个“简陋”的感觉，怀疑这是一个不会写文

章的人的幼稚的作品，因为句子是这样简简单单，秃头禿脑，甚至丢三落四，没有一点儿华美的痕迹，没有一丁点儿“大师”的标志。在《包法利夫人》中，就充满了这样的文字：

爱玛没有睡，也就是装睡；他躺在旁边，昏昏沉沉，她却醒过来，做别的梦。

没有修饰成分，简白到极点，似乎再丰富的内容也会被写得平淡无奇。又如：

太太买了一顶帽子、一副手套、一把花。先生直怕错过开场戏；他们来不及喝汤，就赶到剧场门前。门还关着。

几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全都是这样的文句。肯定有不少读者随手翻翻，就打消了读下去的念头。但是真正读下去，熟悉了这种文体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的人，就会被它迷住，就会从这极度简白中读出它的丰饶、精确、优美，以至被这简简单单的字句陶醉得难以自拔。我就是一个这样的读者，那本带有速写插图的《包法利夫人》几乎成了我藏书中的至宝。在我看来，福楼拜和李健吾在这部小说上的文体探险，真正称得上是“珠联璧合”。

周作人也是一个文体探险家，他也追求文章的冲淡简朴的外形。尽管他不写小说（早年的偶一为之，一直被他自认为是失败的记录），他所喜欢的是舒缓自然的长句，这正与李译福楼拜的文体节奏相反，但他们内在的相通之处却是不难发现的。那就是：不求华美，自创新格，归绚烂于平淡，含丰饶于简朴。因为平淡简朴到了极点，变成了稚拙，于是就易于为没有经验的初读者所不屑。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可找到。同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读者可以一下子就接受柳青的充满理智的激情与精致细腻的心理刻画，也可以接受周立波的诙谐打趣外加淡淡的白描，即使明知他们的有些作品被过去年代的观念紧紧地笼罩着，至少也会马上承认他们是有水平的作家。但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提示或阅读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遭遇孙犁的作品，恐怕情形就不这么乐观。笔者曾有意识地了解过几位孙犁小说的爱好者，他们最初对孙犁的作品都是排斥的，那第一个感觉是“土”，“单调”，“看不出好在哪儿”，甚至有说“读上去蛮滑稽的”。但渐渐地，他们从貌似简陋的文句中品出了诗意，感觉到了深藏的人情味和作家内心的真挚，进而读出了这与众不同的文体的非凡的节奏。如果去掉孙犁小说中那些优美的写景与抒情的段落，那么，孙犁的叙事方式与另一世纪另一国度的福楼拜，是确有一些相像之处的。

这种现象在绘画中也同样存在。举中国近现代的四位国画大师为例：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与潘天寿，当年最为一般读者所激赏的是齐白石，而最不受欢迎的无疑是黄宾虹。20世纪50年代初期，黄宾虹甚至连画也卖不出去；画界内的人钦服他的学问，却也往往对着他的画摇头。他早年的简笔山水和晚年的枯笔重墨，都带有“文体探险”的性质。它们“不入时人眼”，而他也从不媚世。几十年过去了，黄宾虹的价值被不断发现和发掘，他现已成为最受欢迎和最值得研究的前辈大师。有论者总结说：“齐白石与黄宾虹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具有广度，从雅俗共赏的生活情趣上确立自己；而后者更富深度，从精微内炼的学术意味上确立自己。”^①

^① 卢辅圣语，转引自《借古开今——吴、齐、黄、潘四大家学术研讨会综述》，《美术》1992年第10期。